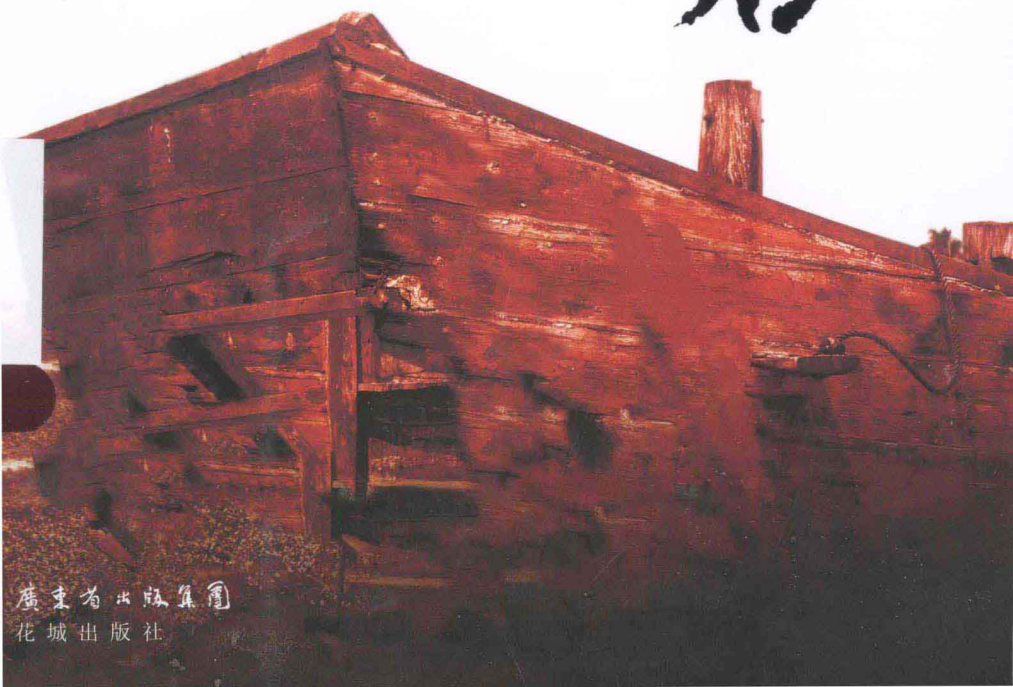


尤凤伟 著

海客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尤凤伟 著

读海客

《中国1957》修订版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沧海客 / 尤凤伟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60-6672-4

I. ①沧… II. ①尤…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04461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贤治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书 名	沧海客 CANG HAI K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2.5 1 插页
字 数	30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1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89
第三部 御花园遥祭	195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281
尾声	384
后记	390
修订后记	396

第一部 京畿秋千架

北京人大都知道西城区有个草庙子胡同，如同重庆人知道歌乐山有白公馆渣滓洞一样。将其相提并论自会使人想到前者与后者一样不是个温柔瑞祥之地。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这座胡同的24号大院是关押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地方，后来当了副总理的薄一波和当了北京市长的彭真都曾在这里被关押过。日本人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北平，他们也在这里关押政治犯人。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这大院照旧做同样的用场。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被历代统治者委以重任，使人想不通这地场究竟有何玄妙。说起来呢这里实在是普通而普通，寻常又寻常的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即使走到近前都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凶险地。胡同里人来人往，大门口没有岗哨，墙上没有电网，从敞开的大门看进去与许多北京人的住处没有任何区别，可当你走进去，再拐上一两个弯，就感到情况不对了，脑袋里会一下子跳出两个字：监狱。

我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这座赫赫有名的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苦难从这个日子开始使我终生都对主难以亲和，尽管我知道这没来由，可当没来由的灾祸突降于身时你迷乱的思绪也只能没来由。我没有查过中国当年的历书，那个飘雪的寒日当是冬至的前后日。冬至——冬天不期而至。而对于我，长达二十二年的人生严冬也就从这一天开始。

我被关进24号牢房，犯人代号是28611。

我不想对牢房多做描写，古今中外描写牢房的文字已经够多，况且牢房就是牢房，不是家居、旅店和宾馆。不要奢望牢房会给

你的日子带来舒适与安康。但我发现这间 24 号牢房有些特别：只有门没有窗，像一座洞窟。头上亮着一盏狱灯，很昏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犯人坐在一个从墙这头通到另一头的大通铺上吃饭。这时已快吃完了，因为犯人们正在进行吃饭的最后一道工序——仔仔细细舔自己的碗。来了新犯人他们无动于衷，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这期间只有一个四十岁模样的长脸犯人认真打量着我。看了一刹开口问：刚来的？我点点头。他再问：从哪儿来的？我说 K 大学。这时其他犯人便一齐把眼光瞅向我，似乎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让人留意的怪物。正诧异间，长脸犯人开始向我自报家门，说：我姓崔，大伙儿叫我崔老，以后有事就问我。介绍完自己，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见我摇头。便冲门高喊报告。一道亮光从靠走廊的那面墙上射进牢房，就像刺入黑暗世界里的一把剑。我发现那是开在墙上的一个喇叭形的洞，外窄里宽。不久洞外便现出一张脸，我认出是刚把我送进牢房里的管理员。他厉声问什么事。喊报告的“崔老”说新来的犯人没吃早饭。外面说：派个人去打。洞门关了。一会儿铁门开了。崔老指指通铺上的一个小个子犯人说你去吧。被指定的小个子犯人像拉肚子跑茅房般蹿出牢门。铁门又重新关闭了。进屋时间稍长眼睛便适应了昏暗的环境，我看清这是由两小间连成一大间的监室。贯通屋子的大通铺是土垒成，上面铺着席子，一个挨一个摆着铺盖卷。刚吃过饭的犯人坐在各自的铺盖卷前，坐姿整齐划一，打眼一看，活脱脱是一拉溜秃头和尚在打坐。也许正缘于有了这种初始印象，后来我只要看见了庙宇便会想到监狱，看见和尚又会想到犯人。其实这类比是很荒谬的，这两者形似而神不似：和尚是为信仰而磨炼自己，犯人是接受惩罚而坠进无边苦海。

铁门再次开启，派出去的小个子犯人为我打来了狱中早饭，放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这份饭立即吸引了全牢房犯人的目光。我打量一下我终生都难以忘记的头一顿狱饭：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米面窝头，一碗玉米面的稀粥，一小块咸萝卜。崔老指指说老周你吃吧。老周？我不由一怔，以为是说别人，可当明白老周就是

我时心情一下子变坏了。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我的心情有多么好，自从被批判被打成极右后心情就没有好过，而今天被逮捕进了监狱则心情更糟。但此时此刻的一声“老周”使我在意识中明确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的青春已被关在铁门之外，离我而去了。我不再是“小周”、“周文祥同学”、“花和尚”（同学给起的外号），而成了“老周”以及28611，我成了灰蓬蓬犯人族中的一员。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情绪占据了我的心，当崔老好心催促说老周趁热吃吧，我竟然冲他吼叫起来：我不吃！不吃！崔老惊讶地看着我，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神情紧盯着我，一时我被盯得有些慌，心想不吃还违犯了狱规了么？我不吭声。崔老和众犯人还紧盯着我。崔老问一句：老周你不吃了吗？我说不吃了。他又问一句：老周你真的不吃了吗？我还说不吃了。他紧接着再问：老周你确实不吃了么？我被问糊涂了。反问道：难道不吃不行吗？崔老没回答，却朝小个子犯人做个手势说：分了吧。分饭的过程我两眼瞪得圆圆，惊诧不已，不是我初来乍到少见多怪，而是这过程实在离奇，那不是分一份粗劣的饭食，是在分金、分银、分珠宝。小个子犯人将窝头按照犯人的数目掰成麻雀蛋样的小块，摆在炕前的长条木板上，接着再用一块瓦片将咸萝卜条切成同样数目的小块，摆放在每块窝头的前面。之后小个子犯人退后几步，仔细端详着各份额是否分得均匀。不是尺卡称量，手眼操作自然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就再做比较，从大点的掐下些补充给小点的。调整过后再退后端详，直到他觉得差不多了，方把眼光转向崔老。崔老又向大伙征询：可以了吧？一个浓眉犯人朝大伙挤挤眼，说句：爷俩比鸡巴一个吊样哩。大伙一齐笑了。崔老说拿吧。大伙就各自拿一份丢进嘴里，香甜地咀嚼着。但这并没完结。接着又分玉米粥。分稀不及分干的方便，大伙拿出刚舔净的碗摆在木板桌上，小个子犯用小勺将粥舀进每只空碗里，分过一轮后尚有些剩余，接着再分，这次就是半勺了。分完后小个子犯人将空碗递向崔老，崔老说你舔了吧。小个子犯人脸立刻显出受宠若惊的神色，极其神速地将舌头伸进碗里舔将起来。事实上别的犯人也以同样的

方式受用了自己的那一份。这就是我入狱头一天所见的一幕。这一幕令我不寒而栗，也令我震惊与困惑：在这个罪恶之地，在这些犯了罪的人中间，为何能如此自觉而严格地遵循着一条公平的准则？须知这一切在狱外世界里也并非被认同与施行，更不会做得如此一丝不苟。总之，这是我在监狱这所大学里上的头一堂课。

“28611 起来！”

我是在梦中被人吆醒的。都说犯人在狱中的头一个夜晚无法入眠，而我在经过一番辗转反侧后竟睡过去了，还居然做了梦。看来嗜睡和多梦是注定要伴随我一生了。我是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说法的。白天冯俐不断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担心她不知道我已被捕仍将写给我的信放在传达室里，这将对她不利。我就在梦里见到她，没对她说起信的事。而且连自己被逮捕这一事实都忽略了。我和她一起爬山，山很高很荒凉，光秃秃一幅冬天景象。

“28611 起来！”

我睁开眼，只觉得满眼陌生。这是在哪儿？是谁喊 28611？28611 是什么玩意儿？狱灯亮着，显得比白天亮些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地方，直到我看到那位姓庄的管理员（他的姓是崔老告诉我的）和一名提盒子枪的武警战士站在敞开的铁门处，我梦游出窍的魂魄才回归于身。这是提审。白天崔老已经提醒过我：这座看守所习惯在夜间审讯，新来的犯人又大都在当晚初审。崔老说知道这规律很重要，否则黑下冷丁被持枪的警察拉出去会以为要被秘密处决。也确实有犯人不知底细被吓傻了的事。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被窝里弹起，又跳到地上，从一双挨一双的鞋中间认出自己的那双穿在脚上。监房里极其安静，这么大的声响都没使睡在炕上的犯人动一动。好像炕上摆着的不是活人而是一拉溜僵尸，这景象使我惊惧不已。走出牢房门，铁门在身后关闭。我的管辖权即刻从管理员移交给武警战士。他押着我从走

廊走到院子。头一个感觉是冷，出奇的冷，冷得浑身打战。我立刻后悔没穿那件带进狱中的呢子大衣。大衣是考入 K 大后回家过第一个春节，临走时父亲把它披在我的身上，说北京的冬天冷用得着。今早当我知道将被逮捕晓得今后确实用得着便穿在了身上。这一着使我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劳改时光中大受益处。因头一次受审我不晓得去审讯室的路径，而且按规定犯人不能走在押解人员的后面，我只能依照武警战士在身后发出的“向左”、“向右”的指令，在一幢幢房子里穿行。这些房子大都有灯光溢出，我知道皆是监房。监房里的长明灯如同它的名字永远明亮，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却亮堂堂。深夜的牢狱大院寂静无声，人间的凶险地竟似温柔之乡。说起来世事就这么荒诞不经，可叹又可笑。就这样我在武警战士的口令下一步一步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是一幢独立的平房，里面坐着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一个四十几岁，圆胖脸，胖人显和善。他是审讯员。另一个二十刚出头模样，是书记员（他们的职务分工是审讯后知道的）。进屋后我站在地中间，他们不理不睬仍旧看桌上的材料，就好像眼前没我这个人。我不知所措，时间愈久心里就愈慌。不知过了多久，五分钟？十分钟？圆胖脸审讯员才抬头打量我一下，然后指指我身前的一把椅子。我会意，走过去坐下了。

心弦放松后我才觉出屋里很暖和，原来屋角生着一只火炉。审讯员先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没应声。他说叫你必须答到。我说是。他说周文祥。我说到。他说周文祥你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批捕，在案件审理期间须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听明白了？我说听明白了。嘴里这么说，心里却一下子想起崔老白天口中念叨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明白是说给我听，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并不觉得可取。我很清楚自己的问题，说我是反革命完全子虚乌有，我无罪，无罪便无隐瞒处。坦白和抗拒都谈不上。

审讯正式开始：

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 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他们的年龄职业政治面貌？

父亲周峻青，五十八岁，在烟台当店员，群众；母亲周彭氏，五十六岁，理家，群众；大哥周文起，二十八岁，工人，群众；二哥周文来，二十六岁，工人，群众；姐姐周文娟，三十二岁，教师，共产党员；弟弟周文吉，二十岁，在校学生，共青团员。

主要社会关系？他们的职业、政治面貌？

大叔周峻山，原籍务农，群众；小叔周峻杰，原籍务农，群众；大姑周峻英，原籍务农，群众；大姨焦彭氏，原籍务农，群众；小姨彭玉敏，军人家属，舅舅彭玉泉，原籍务农，基干民兵。

个人履历？

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一九五四年高中毕业后考入 K 大学。

婚姻状况？

未婚。

未婚妻状况？

我诒住了。眼前现出冯俐俏丽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针

扎了一下，随之一抹悲伤惆怅的思绪从心底泛起，进而扩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关系有明确界限，朋友、恋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阶，各有各的位置。这么说吧，在大学三年间我与冯俐的关系是一年一个台阶向上攀登，去年春节各自将对方的照片带回家让家人过目，双方家人俱表示赞成，而且我俩已将明年的毕业分配与今后的婚姻联系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报》那篇著名的社论《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的事情确实“起了变化”，我成了现行反革命，成了阶下囚……

我没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开始交待你的问题。审讯员说。

开始了。我在心里说。

开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审讯员说。

如实交代问题，这样才有出路……我在心里默念着审讯员的提醒，对这种提醒我一点儿也不陌生，从反右初期的大会小会帮助到打成极右后的大会小会批判，这种话我听得太多，可谓如雷贯耳，有苦口婆心者说得情真意切，有恨铁不成钢者说得义正词严，于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沦为阶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为我指“出路”……

是。我说。

你说说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审讯员目光霍霍地看着我，书记员也抬头紧盯着我。

我被问愣了，瞪大了眼。本来对审讯我是胸有成竹的，这几个月来，我的问题就像庄稼人捣粪似的被捣来捣去，早已烂熟于心，不怕问。但是……

说说这三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回答不出，心里充满疑惑：这三天怎么啦？我做了什么？为什么单单问这三天？他这么问，就证明了这三个日子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可我一下子无法从过去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三天干了什么。我是个记忆力很差的人，过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着的扑克

牌，我做不到按别人的要求从里面抽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或者几张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怎么不回答？审讯员问。

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实话实说。

审讯员的脸绷了起来，很白皙的面皮在灯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个白萝卜在碗里蘸了酱。他冷笑笑，一字一句道：实话对你说吧大学生，我们不怕你不交待问题，当然，不交待就只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们也不能放，不放就老关着，老关着就是无期徒刑。国家尽管不富裕，可打扫一下囤子底，也够关你一辈子吃的。我说的话你明白不明白？

我说明白。

他说明白就赶紧交代问题。

我苦思冥想，最终摇了摇头，说：您说的这三天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记不起来了？那就好好回忆一下。

我开始回想。什么叫开动脑筋绞尽脑汁？这时就是。我没有抵触情绪，当了犯人，接受审讯是天职。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断定这三天与我的问题肯定有重大干系。因此必须认真回忆，做出回答。于是我苦思冥想，边想边默念着那三个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过于紧张，也可能是回忆不得要领，我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如此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他的话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

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 from K 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宿舍外面的校园还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浑然不觉，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假几分钟被窝，照例在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方向。如稍有警觉，当能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当能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走出盥洗间在走廊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已被公安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

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警惕的眼光盯着我。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松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松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藉。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

食堂吃饭，晨曦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与孟。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走得飞快，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依然恪守师道尊严，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吭声，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识趣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滋滋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刊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只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昨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稳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